

Summer 2017



# 亚洲研究动态

## Asia Research Network

June No.37

2017年6月 第三十七期



##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37 期  
2017 年 6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65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 编委会顾问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 勇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潘一山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Regsuren Bat-Erdene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 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azartseren Boldgiv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 CONTENTS

## 目录



### P.02

→ 2017年5月27日，“上海论坛2017”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亚洲与世界：新动力、新格局、新秩序”。



### P.05

→ 2017年5月6日，“心相通：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召开。

## 特稿

- 02 “上海论坛2017”年会举行
- 05 “心相通：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 07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2017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召开

## 学术活动

- 09 “作为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甲柏连孜——历史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举行
- 10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的《〈先祖阔尔库特书〉研究》首发式举行
- 12 第十二届中国—新加坡论坛公开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 13 首届全国高校国际汉学与中华文化外译学术研讨会举行
- 16 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9届国际学术大会举行
- 18 “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至第四讲举行
- 25 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第十期举行

## 研究进展

- 26 对亚洲五国近年来跨境资本流动的观察与比较研究



## “上海论坛 2017” 年会举行

2017年5月27日，“上海论坛2017”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亚洲与世界：新动力、新格局、新秩序”。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翁铁慧、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许涛、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韩国SK集团董事长兼CEO崔泰源、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等出席论坛并致辞。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

主任焦扬主持。主旨演讲由朴仁国主持。来自全球各地智库、高校、政府、企业、媒体等机构的嘉宾和代表共700余人参加了论坛。

开幕式上，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Christopher Pissarides）作了题为“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主旨演讲。皮萨里德斯认为，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处于活跃发展的



Christopher Pissarides

环境下，探讨新技术对于政治、经济改革的影响显得尤为必要。皮萨里德斯爵士评析了新兴技术对众多行业的影响，认为中国等国家将在未来迎接医疗、健康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变革。

土耳其第11届总统（2007—2014）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形象”为主题的演讲中，回顾了国际秩序的发展历史，并介绍了土耳其与中国近年来的合作发展成果。他认为，在塑造新的国际秩序过程当中，中国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各国唯有开展精诚合作，才能真正实现新的秩序，造福世人，实现共同繁荣。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捷米尔·萨里耶夫（Temir Sariyev）作了题为“中国与中亚在‘一带一路’中的关系”的主旨演讲。萨里耶夫先生在回顾了世界格局中的动荡关系后提出，对于全人类而言，由一个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并且会进一步恶化和加剧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在于寻找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双赢模式。



Abdullah Gül

匈牙利央行行长、前经济部部长杰尔吉·马托奇（György H Matolcsy）作了题为“欧洲的稳定与繁荣离不开中国”的主旨演讲。他首先介绍了匈牙利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的非传统经济措施，指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马托奇先生希望匈牙利能够成为“一带一路”进程中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也希望“一带一路”能够更好地促进两个大洲之间的交流和发展。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黄仁伟作了题为“世界权力转移与中国智慧——以‘一带一路’为例”的主旨演讲，他借助对“一带一路”案例的剖析，介绍了中国在当今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所运用的中国智慧的特征。在他看来，中国在建设“一带一路”时需要知道各国的想法，同时也需要各国知道中国的想法。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会产生一种超越国家、超越历史、超越意识形态的智慧，助推世界权力新秩序的建立。

本届年会分为“全球治理”、“中国与世界”、“网络治理”、“生态治理”四大板块，共有11



Temir Sariev



György H Matolcsy



黄仁伟

场圆桌会议、14 场子论坛，议题涉及大国关系、金融创新、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和中东欧“16+1”合作、网络安全、能源互联网、环境保护等热点话题。与会代表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展开了深入交流与讨论，力求集政、商、学界之大成，多角度、全方位共话亚洲与世界的发展动力与未来。

本届上海论坛致力于打造全球智库汇聚平台。在向全球开放圆桌和子论坛承办工作的机制下，上海论坛已接到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区逾 70 家高校、智库、企业、媒体等机构的申请，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印度、以色列、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土耳其等国参与申请。令人瞩目的是，拉脱维亚国际关系研究所、爱沙尼亚外交政策研究所、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等众多高校及智库机构申请并参与办会，使得国际化和多元化的上海论坛成为国际智库与智者思想交流与碰撞的舞台。

5 月 29 日，“上海论坛 2017”年会闭幕。杜克大学历史学系讲座教授、著名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历史学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阿尔卡贝·阿克贝（Arkebe Oqubay Metiku）在闭幕式大会上作了主旨演讲。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大型学术论坛，旨在搭建中外政商学界人士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为区域发展及国家大计建言献策。自 2005 年创办以来，出席论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达 3000 余人次，论坛一直坚持创新引领，以求更好地为人类进步、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服务，已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论坛品牌。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心相通：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 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7年5月6日，“心相通：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3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勇副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包茂红教授致辞，阐述了此次会议主题的意义：一是东南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东南亚国家官方对这个倡议都持积极态度；二是北京大学推行“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建设计划，东南亚学

研究中心理应参与其中，需要在守正的基础上积极创新，通过这次学术交流进一步强化北大的东南亚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广西东南亚研究会会长古小松教授在致辞中对本次会议的举行表示热情支持。

会议发言聚焦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全方位文化交流，对交流的历史与当下的形式、内容、特点、机遇、问题、对策等进行研讨。在关于民间外交的发言中，暨南大学庄礼伟教授提出“民间社会实力”是国家对外柔性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应促进中国民间社会与东南亚民间社会的有机对接，夯实双边关系的社会基础；外交学院查雯博士提出应大力开展中国城市与东南亚国家节点城市的城市外交，并融入国家整体外交的

大战略中，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形成有力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方冶博士强调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在形式上要因地制宜，在内容上要推陈出新，既要体现传统特色，更要反映新时期的核心价值与建设成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王丽娜呼吁重视青年群体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的影响和作用，青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建设的未来。

在关于制度文化交流的发言中，广西社会科学院古小松研究员回顾了越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越南民族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征，指出越南在本土民族文化基础上，带有明显的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色彩，但汉文化仍处于中枢地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志强教授通过明代中朝越文化关系特点的比较，指出明代中朝关系与中越文化关系的特点仍然是由朝贡制度下中朝越关系和三个国家各自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因素造就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聂槟博士通过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表述，结合中国在市场经济上的定位，比较了二者之间观念的影响与借鉴。

在关于人文与教育交流的发言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宋清润副研究员进一步强调人文交流的重要性，系统总结了中国与东南亚人文交流的目标和影响因素，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黄轶博士通过菲律宾语中的中文借词来观察中菲两国在文化上的融合，以及中菲两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交流，指出中国文化已成为菲律宾社会文化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傅聪聪博士认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人文交流能增信释疑、构建互信，最终有利于实现两国民心相通，形成彼此信任友好的民意基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丹丹回顾了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的发展及中国与印尼之间高

等教育合作情况；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玥博士讨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印尼语教育与用人需求问题，指出印尼语人才在供求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明显的错位。

在关于文学与翻译交流的发言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夏露副教授通过越南古典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借鉴及其民族化历程的研究，认为其对中国文化的向心与离心趋势交错推动着越南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塑造了越南的民族精神，深刻影响了中越关系的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嘉副教授以小说《卖玉人》为例，讨论了20世纪初期越南的中国小说仿作现象；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熊燃博士在比较诗学的视域下对泰汉诗歌翻译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中泰两国有各具特色的诗学传统，译者唯有运用比较视野并发挥其主体性，才能消除审美接受的隔阂，实现两种传统的对话与交融，高品质的翻译是高水平的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基础。

本次研讨会在此时举行具有重要意义。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东南亚地区有多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此次论坛，充分说明东南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东南亚国家官方对这个倡议的态度。“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本次研讨会正是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五通”中的“民心相通”，它是保障前四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能够顺利实施的社会基础，但也是最为复杂、周期最长、见效最慢的一通。本次研讨将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推行起到积极作用。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2017 年科研项目 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召开

2017 年 4 月 26 日，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了 2017 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审议并评定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2017 年科研资助立项项目。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丁超、郭连友、郭棲庆、黄玫、李雪涛、李永辉、梁燕、王建斌、张朝意、张剑、张西平、章晓英等 12 人出席。会议由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张西平主持。

会上，中心副主任郭棲庆汇报了中心成立十年来的科研资助项目总体情况；介绍了 2017 年科研项目资助申报情况及评审注意事项；通报了 2017 年学术著作资助出版立项评审结果。

中心成立十年来，共资助课题研究项目、信息汇总项目、学术著作资助出版项目累计达 252 个；与校内相关院系共同主办或协办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 43 次；分别与国际中国文化研究

院、全球史研究院以“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文化传统”、“全球视野中的亚洲文化”、“全球史与中国 2017”、“亚洲文化”为主题共同主办学术讲座 24 场。另外，中心还联合英国剑桥大学东方文化学会开展了“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了 10 名剑桥大学青年学者到访北外，在人文与社会、军事与外交、经济与贸易、医学与科技等领域与北外师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截至目前，课题研究和信息汇总共有 150 个项目正式结项，提交成果论文 109 篇、学术著作 2 部、学术著作手稿 4 部、研究报告或资料汇编 45 份。课题研究项目成果论文发表 94 篇，其中 CSSCI 论文 25 篇、A&HCI 论文 1 篇、核心期刊论文 8 篇、一般论文 60 篇。在中心立项资助出版的 31 部学术著作中已有 17 部正式出版，其中 7 部著作列入中心推出的“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

郭棲庆在会上还通报了本年度获中心资助的国际学术交流支援项目（International Scholar Exchange Fellowship, 简称 ISEF）学者人选，来自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孙健老师将作为 2017—2018 学年的 ISEF 学者赴韩国从事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

本年度中心共收到各类项目资助申请 20 项，其中：课题研究申报 13 项、学术著作资助出版申报 2 项、学术会议申报 5 项，经过与会委员的认真审阅，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最终评定出本年度中心拟资助立项的 19 个项目，其中课题研究 12 项、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2 项、学术会议资助 5 项。项目选题涵盖了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文学、教育学、跨文化传播等 8 个学科领域。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国际商学院、阿拉伯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英语学院、专用英语学院、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全球史研究院、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等多个学院、系部的教师和研究人員参与了本年度的项目申报工作。

与会委员一致肯定了中心为繁荣与发展学校学术科研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望中心再接再厉，发挥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的学术平台与桥梁作用，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及教师与科研人员的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 “作为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甲柏连孜——历史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7年4月1日至2日，“作为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历史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北外全球史研究院、外国语言研究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院东亚系、德国柏林东西方语言与文化研究协会共同主办，北外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孔子学院工作处和图书馆协办。

会议期间，来自国内外语言学界和汉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德国19世纪著名的语言学家、汉学家甲柏连孜的学术著作、思想和生活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会议分设“甲柏连孜及其时代”、“甲柏连孜与普通语言学”、“甲柏连孜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等议题，共有15位学者作了主旨报告和发言，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与此同时，“甲柏连孜：生平与成就图片展”在图书馆一层展厅开展，北外孔子学院工作处处长张晓慧主持了图片展开幕式。该展览为期15天，以图片和实物的形式对甲柏连孜做了全面的介绍，展览中展出的甲柏连孜后人提供的遗物、手稿和照片等珍贵资料尚是首次在亚洲亮相。

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出生于德国一个世袭贵族家庭，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作为索绪尔（F.d.Saussure, 1857—1913）的前辈，他更早地提出了共时语言学的基本思想，成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先驱；他和他的父亲接触并研究过200多种语言，其家庭藏书涉及2000多种外语，他被誉为19世纪语言学界的



天才。甲柏连孜在众多汉学家当中极为突出，他所著的《汉文经纬》（1881年）在众多汉语教科书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至今仍被汉学界认为是对古汉语语法最为全面、可靠的研究著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汉文经纬》第一次彻底摆脱了欧洲人以拉丁语衡量每一种语言的成见，展现出了汉藏语言自身的独特性，并系统、清晰地描述了汉语语法现象。他的另一巨著《语言学》（1891年）历经多年积淀而成，由于其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印欧语系比较语言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多年来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是通过对学术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甲柏连孜已经预见到了20世纪语言学发展的趋势，他远远走在了他的时代之前。值得欣喜的是，甲柏连孜的开创性研究与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为人们所知。

全球史研究院



##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的 《〈先祖阔尔库特书〉研究》首发式举行

2017年4月28日下午，由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刘钊副教授所著的《〈先祖阔尔库特书〉研究》中文版首发式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举行。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马汀·米尔扎耶夫、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党总支书记葛冬

冬、刘钊副教授以及北外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和学生参加了首发式。

马汀·米尔扎耶夫在致辞中首先对中国学者给予阿塞拜疆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与关注表示感谢，对阿塞拜疆民族文化遗产推出完整汉译表示祝贺。他表示，世界上对《先祖阔尔库

特书》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8 世纪，德国学者将乌古斯语叙事诗“先祖阔尔库特”12 组诗歌中的一组译成了德语，其后，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也出现了该领域的研究者。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首任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的大力推动下，《先祖阔尔库特书》在阿塞拜疆以各种形式得到广泛传播，是家喻户晓并深受阿塞拜疆人民喜爱的历史文化遗产。马汀·米尔扎耶夫表示，《先祖阔尔库特书》研究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阿塞拜疆文化交流的一项重大成果，他将以使馆名义把此书作为礼物转呈总统和议长。

葛冬冬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北外亚非学院积极开展亚非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方向广泛，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及人才合作交流，努力为深化国家间双边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受邀出席首发仪式的中央民族大学张定京教授表示，《先祖阔尔库特书》研究是“一带一路”上绽放的艳丽花朵，为中阿两国文化交流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则梳理了《先祖阔尔库特书》的世界影响及国内研究情况并汇报了新出汉译本在国内学界引起的热烈反响。

《先祖阔尔库特书》是一部反映古代突厥语

各民族历史、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以及诗歌演唱形式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史诗，传播了自由、正义与和平的思想，是突厥语民族历史文化的花萃，因此受到阿塞拜疆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先祖阔尔库特书》研究》是刘钊集转写、汉译、语法和索引于一体的语言学研究著作，为国内学界其他领域研究《先祖阔尔库特书》提供了重要参考。首发仪式上，刘钊向使馆赠送了该书并用双语演说了《先祖阔尔库特书》片断。

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台、阿塞拜疆国家新闻社、国内俄语广播等新闻媒体对首发式进行了现场采访和报道。

刘钊，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土耳其语专业副教授，长期从事土耳其语教学、研究，对古突厥语和乌古斯语也有涉猎，主要研究成果有《先祖阔尔库特书》研究》《古突厥语语法》和《土耳其语语法》等。

亚非学院

## 第十二届中国—新加坡论坛公开论坛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2017年5月10日上午，第十二届中国—新加坡论坛公开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五层会议厅举行。论坛由北外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承办，主题为“中新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论坛中、新方主持人分别为北外副校长闫国华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主席哥比纳·比莱（Gopinath Pillai）。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彭克玉，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学中心主席、中新论坛新方主席许通美等中新双方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中新与会嘉宾从多角度对中新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就中新合作在政治互信、促进贸易发展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新加坡

工商联合总会执行总裁何鸣杰重点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新贸易合作的重要影响。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局副局长彭志明从示范项目出发谈及了两国在政策互通、贸易互通的相关合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光炎侧重探讨了东盟对加强中新关系的重要意义。

许通美在总结环节强调新加坡将继续深入和加强与中国的现代互联互通以及经贸合作。闫国华表示，本次论坛的发言紧扣主题，从多条路径讨论了中新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双方专家学者的交流，为加强中新两国二轨交流，增进中新开展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提问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就中新关系现状与未来发展、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论坛开始前，北外校长彭龙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领导及新方代表团团长及主要嘉宾进行了会见。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北外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商学院、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以及师生约70人参加了会议。

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 首届全国高校国际汉学与中华文化外译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7年5月13至14日，首届全国高校国际汉学与中华文化外译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协办。来自国内外近90所高校的国际汉学学

者，以及中华文化外译学者近200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吕世生主持。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阎国栋致开幕词，他代表南开大学欢迎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他表示，学术会议举办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学术热情和



学术水平。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国际汉学研究和中华文化外译研究如同孪生姐妹可以永远结伴同行，互相丰富学科内涵和促进学术发展，为文化走出去的伟大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介绍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她说：“通晓世界、树立自信、表述好自己，在世界各文明的互动中间找到我们的位置，是当代学人的责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北京语言大学闫纯德教授、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复旦大学马秋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车琳教授等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研讨会设汉学研究、古典文本外译与传播、现当代文本外译与传播、非英语译本翻译与传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8个分论坛，就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国文化（文学）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研究、国际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国际汉学（中国学）人才培养以及中华文化外译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成立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学会（China Academic Union on Overseas Sinology，简称CAUOS）。该学会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二级学会，是为加强全国高校外语学院海外汉学研究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推进国内比较文学和海外汉学的深入研究而构建的全国性高校外语院系的学术交流

合作平台。70余所院校的115名学者成为学会首批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来自23所高校的30位理事。经理事会投票产生了常务理事会，并推举张西平教授任会长，阎国栋教授、梁燕教授任副会长，杨慧玲教授任秘书长，龙宇飞教授任副秘书长。汉学学会的成立，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着国际汉学研究已经植根于各高校外语学院，外语学者由此进入一个崭新而广阔的学术领域，运用汉学研究之长，发挥语言文化优势，担任文化使者，在世界范围与他国学者就中国话题进行平等对话和讨论。此举为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研讨会学术意义深远。首先，首创性地把国际汉学（中国学）与中华文化外译研究纳入同一个会议讨论的范畴，加强了学科交流与互鉴，拓展了视野和思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凝聚了力量。其次，青年人才辈出，国际汉学和文化外译人才学者青出于蓝。近年来，国际汉学和文化外译研究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结束了多年的“潜水期”，一跃成为显学，也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学术焦点。“一带一路”使他们以国际汉学研究为“纽带”，以“中华文化走出去”为路标，带领他们走上了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中学西传之路”。再次，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学会的建立，让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进入了高校外语教师的视野，不仅壮大了汉学研究队伍，还为高校外语教师开辟了新的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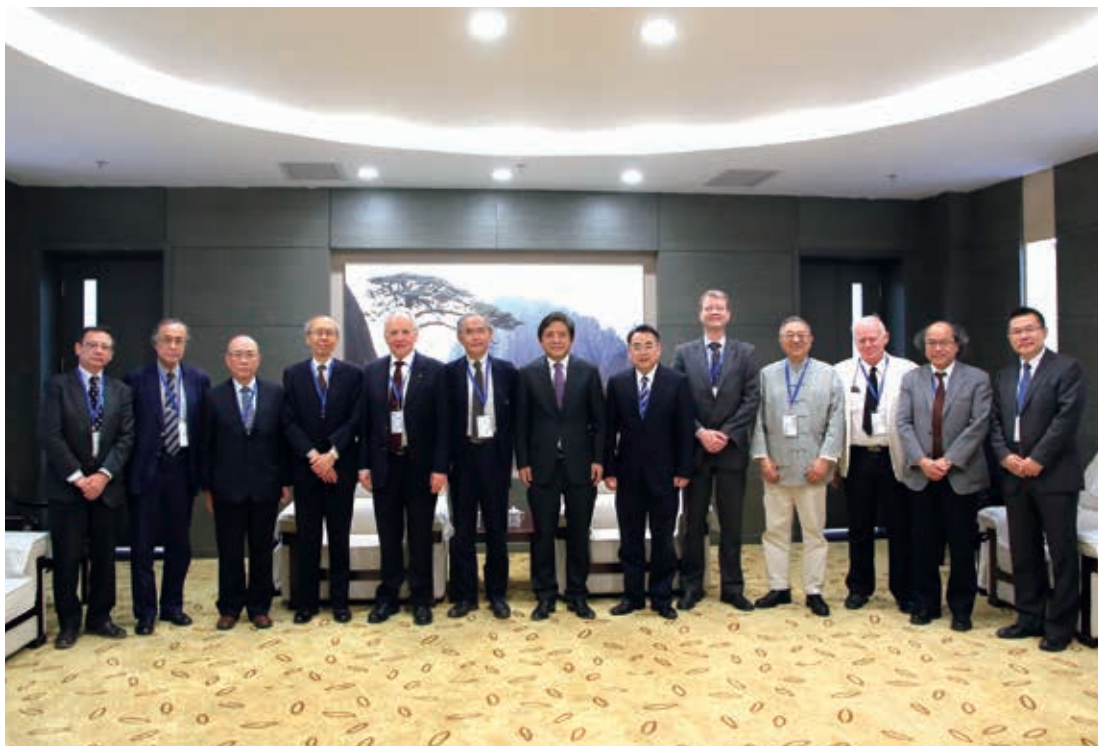
研领域。当前，外语教师正从语言研究逐渐向文化研究转轨，外语人的角色正从“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转向为“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本次大会的召开正逢其时。

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学会会长张西平做了大会总结发言，他充满激情的演讲让会场气氛进入高潮。“百年来，我们以西为师的学徒期即将过去，中国学术进入了调整和新时期，中国学术研究已经在全球展开，中国学者同西方学者的平等学术对话即将展开。在这历史的转折期，我们每位学者都是见证者，应抓住机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在北京召开，外语学科被前所未有地推到了文化交流的前沿！”会议在令人鼓舞的气氛中落幕，同时，预示着下一届研讨会的开始，届时各界学者将齐聚上海外国语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言实出版社等都选派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大会上宣读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丛书”征稿函。

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

## 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9届国际学术大会举行



2017年5月13日至14日，东亚文化交涉学会（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第9届国际学术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东亚文化交涉学会、日本关西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承办。会议以“全球史观与东亚的知识迁移”为总主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出席会议开幕式，来自东亚和欧洲

的200余名重要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会议，会议由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主持。

彭龙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主持了全球史研究院概念史研究中心、知识迁移与留学史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日本关西大学内田庆市（Uchida Keiichi）教授、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周之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处处长张晓慧等分别致辞。



彭 龙



李雪涛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杜塞尔多夫大学前校长、北外名誉教授腊碧士 (Alfons Labisch), 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松浦章 (Akira Matsuura),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泰国国际佛教大学校长、著名汉学家魏查理 (Charles Willemsen) 教授分别作了三场主旨演讲。会议设置了 40 个分主题论坛, 其中特设北外青年学者论坛, 中外学者们在两天会期中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为推动中外文明互鉴贡献了智慧。

会议期间, 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 9 届年会进行了新会长及副会长选举、批准新会员入会

申请和批准 2018 年度大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的议案等事项,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当选为 2017 年度新会长。

此次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国际学术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为推进东亚文明以及东亚与外部世界共享文化、共创未来提供了重要平台, 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良好助力。

全球史研究院

## “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 第一讲至第四讲举行



2017年3月至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和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了以“亚洲文化”为主题的系列学术讲座，分别邀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周以量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王宏志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司徒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陈怀宇副教授作了四场学术演讲。

### 第一讲

2017年3月28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周以量教授作了题为“青木正儿与《北京风俗图谱》”的学术讲座。周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青木正儿其人。青木正儿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戏曲，旁涉中国学术、文物、风俗、绘画等领域。他曾于1925至1926年来中国留学，《北京风俗图谱》正是他留学期间



周以量

请人绘制的。在北京逗留期间，青木正儿发现中国古老的风俗依然活在民间，萌发了请人绘制风俗图的念头。他向日本东北大学申请费用，请北京的画工绘制了一百一十七幅彩图，编辑成册，题为《北京风俗图谱》。图谱分为八个纲目，依次为岁时、礼俗、居处、服饰、器用、市井、游乐和伎艺。

首先，周教授把这本图谱与 1799 年日本出版的《清俗纪闻》进行了比较。《清俗纪闻》是一部关于清代乾隆时期中国福建、浙江、江苏一带的风俗、传统习惯、社会情况的调查记录，调查对象是前往长崎进行商业贸易的清代商人，除了详尽的文字记录外，还有日本画师在清代商人指导下绘制的各种事物的图像。青木正儿在《中华名物考》的自序中曾点名《清俗纪闻》中画的是南方的风俗，而《北京风俗图谱》是他直接请北京人画的北方风俗。周教授通过比较，指出青木正儿编撰《北京风俗图谱》应该是受到了《清俗纪闻》的启发。

随后，周教授简单勾勒出日本风俗画的发展过程，并指出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记述中国

风俗的图书十分丰富。他列举了几十种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日本出版的涉及北京风俗的图书，其中有不少书都采用了图文并茂的记述方式，形成了青木正儿构思《北京风俗图谱》的文化基础。通过分析，周教授提出《北京风俗图谱》远接的是风俗画的传统，但近取的应该是风俗图书中大量使用图像的方法，青木正儿一方面继承了《清俗纪闻》的传统，一方面又在了解当时记述风俗的出版业状况的基础上编撰了《北京风俗图谱》一书。

周教授还把《北京风俗图谱》与其出版前后中国人编撰的两本北京风俗图册进行比较，这两本图册分别为《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和《北京风俗》，前者编撰人员不详，后者为民国时期著名画家陈师增绘制。周教授运用大量图片，让在座师生直观形象地体会到其中的差别。比如，《北京民间风俗百图》绘制的主要是人物，没有任何背景衬托其活动，而《北京风俗图谱》绘制的不仅有人物，还有背景场面，内容更丰富；《北京风俗》的图片带有写意的风格，如果没有文字，很难看出图片展现的内容，而《北京风俗图谱》则是写实的风格，图中人物活动让人一目了然。通过三者之间相互印证，周教授充分展示了《北京风俗图谱》的独特价值。

最后，周教授用青木正儿在《北京风俗图谱》“原编者序”中的一段话说明了青木正儿作为汉学家的远见。序言中，青木正儿说明了其策划图谱编辑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记录下北京遗留的古老风俗，因为他担心在新传入的西方风俗的影响下，这些古老的风俗将会完全淹没。

周教授的讲座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在座师生大受启发。随后的交流互动环节中，几位同学和老师就图片内容、图谱底稿原样出版以及其他有关北京风俗的书籍与周教授进行了探

讨。最后，顾钧教授作了总结，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第二讲

2017年5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王宏志教授作了题为“翻译与中国近代史：从马戛尔尼使团国书的中译谈起”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教授主持。

对于1793年英国第一个来华使团——马戛尔尼使团的外交谈判失败事件，学界一般存在两种说法：一是当时清朝统治者拒绝对外开放通商；二是这次外交失败与之后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直接关系。针对这一历史事件，王宏志教授从翻译的角度入手，向大家展示了他对当时史实真相的新发现。首先他为大家梳理了研究时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其中英文文献包括使团成员回忆录六部、东印度公司档案两部、马戛尔尼1779至1798年所藏书信，以及1743至1801年斯当东父子文档。中文原始资料为《掌故丛编》与《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还有此前学者的中英文重要研究成果七篇。

王宏志教授以问题阐发的形式开始他的研究论述。第一个问题是马戛尔尼使团的国书的译者是谁，对此学界看法不一。学者秦国经提出是当时清朝的钦天监监副、葡籍传教士索德超。但根据斯当东的回忆录与《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所载，使团来华之前便已得到国书译文。法国历史学家戴廷杰又根据斯当东回忆录的内容，认为译者是与英国人同船来华的四个中国人之一的安神甫，但语焉不详。王教授从当时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 William Hamilton 给斯当东的信中发现，那时确有四名中国神父想要同使团一同来华，在信中他们的



王宏志

名字分别写为 Padre Li (Jacobus Li)、Padre Cho、Padre Nyan、Padre Vang。王教授根据《方豪六十自定稿》考证出了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是李自标、柯宗孝、严宽仁、王英。其中李自标、柯宗孝一直陪同使团到达中国。王教授还从资料中发现了意大利汉学家蒙突奇 (Dr. Montucci) 与国书译文之间的联系。蒙突奇曾著有《二帙字典西译比较》，为了与马礼逊争夺欧洲第一汉学家的地位，他在信中提到了他重新誊写英王至中国皇帝国书的中文翻译，并曾与要来华做译员的汉学家一起讨论数月。而据小斯当东所言，蒙突奇的中文水平做抄写刻印尚可，若对译文进行编校，则不能确保。接着就引出第二个问题，英方缘何重新誊写柯宗孝、李自标的译文？这涉及到当时的大清律法，如果直接向中国皇帝呈上柯、李二人的译文，这两个人很可能会面临杀身之祸。

随后王宏志教授将我们的视线引向国书中文译文本身。存档于清廷军机处的译文将繁复典雅的原文翻译得错误百出，很不通顺。而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将英方使节译为“贡



使”。由此之前有学者认为这篇译文使乾隆将马戛尔尼来华的目的误认为向“天朝”朝贡。但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王教授又发现了另外一版国书译文，这版译文明显更为忠实于英文原文，是由通晓中文的译者所译，且在此版译文中，英方使节被译为“钦差”，彰显了英方心目中中英双方的平等地位。王教授指出，这篇译文其实才是乾隆皇帝所见之文，也是由柯、李二人于英国翻译，蒙突奇眷写而成的版本。而乾隆皇帝看完这版国书译文后，对暗示两国平等地位的“钦差”二字非常不满，要求重译，才有了之后军机处所存的那个错漏百出的译文。对此王教授又列出实证，根据中方档案，“英吉利国王表文译文”与“大清皇帝给英吉利国王教谕”均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完成，而马戛尔尼使团则于当年八月十日抵京。乾隆皇帝肯定

要先看译文再行教谕，而这一过程一天之内基本无法完成，由此可见此处“英吉利国王表文译文”为军机处藏版，而在此版翻译完成前乾隆帝已经阅读过英方翻译并上呈的译文，方能在同一日完成“大清皇帝给英吉利国王教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角度出现转向，即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放在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看问题。王教授谈到，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日益频繁，同时翻译人才的缺乏不断造成各种问题，因此通过翻译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他还举出鸦片战争的例子，精通中国情况的马儒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之子）在战争中为英方提供翻译情报，并预见性地指出若攻打南京，中国定会投降。中国战败后，《南京条约》的翻译与签订也是由英方主导。由于当时中方缺乏

精通英文的译员，所以国人在当时并不了解条约中英版本的差异。因此《南京条约》签订之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条款上，还在于语言方面。

王宏志教授严谨细致的论证体现了他的深厚学养，他丰富精深的见地对如何搜集材料与研究视角方面启示颇多。讲座最后多位老师同学就英国学者对此译本的研究、东印度公司是否将英方的条件提前发往北京、马戛尔尼使团是否了解军机处所藏译文、礼品清单未被重译的原因、运用旁证的方法甄别回忆录中的历史真相、后殖民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当代译本的研究价值等问题与王教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 第三讲

2017年5月1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司佳教授作了题为“《三字经》与近代中西语言文化接触”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李真副教授主持。

司佳教授从同学们所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三字经》入手，首先在宏观上使同学们认识到此《三字经》并非我们所熟知的“人之初，性本善”，而是新教传教士在文化适应策略下，对中国传统蒙学形式进行学习、结合西方基督教教义而进行的新的创作。

司佳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传统蒙学《三字经》的外译情况，18至19世纪，《三字经》的西文翻译有十三种之多，如英国传教士马兰(S. C. Malan)的英译本《三字经》(1856)、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us Julien)所译法语版《三字经》(1864)、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 A. Giles)所译《三字经》(1900)等。司佳教授引用黄时鉴先生的话对传统蒙学《三字经》译本进行评价：“它们既是交流的载体，又是交流的中介形式”，阐



司佳

释了西方通过翻译中国传统蒙学《三字经》，既可以学习中国语言，又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

司佳教授由此引出历史上还曾出现过的其他三字经，如麦都思(W. H. Medhurst)基督教《三字经》(1823)、《训女三字经》(1832)、太平天国《三字经》(1855)、清末《新学/时务三字经》，均采用了中国传统《三字经》三字一读的形式，且与传统三字数相当，即篇幅在1200字左右，在内容上则加以改变创新。如洋务运动中清末《新学/时务三字经》，意在传播新学知识，故在内容上抛弃了传统的内容，将中国定位为“世界的中国”，而这些正是当时新型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内容。

随后，司佳教授重点介绍了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出版的麦都思的基督教《三字经》。麦都思作为新教传教士，本着适应性的传教策略，基于对中国概况的了解，很快便开始重视蒙学《三字经》。加之华人教会学校、南洋华人移民后代识字教育需要，以及之前新教传教士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等

对英国独特的问答文体的翻译与教学运用的失败，都使得麦都思开始运用《三字经》的形式，以调和识字需要与宗教传播之间的矛盾。

司徒教授重点从“互文性”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麦都思的基督教《三字经》进行了分析。首先，互文性及历史语境（intertextuality and historical context），即马礼逊、米怜、麦都思所译各版本之间，无论其文体如何不同，或问答体或小说体或三字经体，其在内容上都互相接近，即都为基督教教义，且都体现了其在创作中对受众的关注，更是新教传教士适应性传教策略的体现。其次，在形式和内容上，司徒教授重点强调了版本校勘的研究价值。从1823年至20世纪20年代，麦都思基督教《三字经》先后在巴达维亚、新加坡、香港、宁波等地再版与重版，包括方言本在内共有32种。各版本之间在细节上，尤其是用词方面又有着细微的变化，如对“上帝”的翻译上先后便有“主”、“神主”、“上帝”等各种用词。麦都思基督教《三字经》正因其沿袭了中国传统蒙学《三字经》的社会功用，尤其是对于南洋华人劳工与船民受众，使识字教育与宗教传播有调和的余地，成为英华书院1820年以后使用的基础识字课本，为在南洋地区争取信众与面临的文化竞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麦都思的基督教《三字经》之外，司徒教授还对《训女三字经》与医学传教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通过麦都思夫人的妹妹，号“马典娘娘”的Sophie Martin所作的《训女三字经》与1864京都英国施医院（Peking Hospital）《三字经》两个例子以及丰富的图书图片资料，使听众对新教传教士对女性的教育情况与医学传教的范例有了明了的理解。

最后，司徒教授对整个讲座进行总结，即

晚清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所运用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及在创作《三字经》时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不仅使我们对于当时的传教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更对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正如李真老师在讲座结语中所说，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其中蕴涵的社会历史宗教背景；而三字一读的这种易于诵读和记忆的文本在当时虽是一种极佳的传播形式，但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基督教思想的精准表达与书写，这其实也给予我们新的启示，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需要不断结合内容对形式加以创新，才能更好地推动文化在异域的交融与接受。

#### 第四讲

2017年6月2日下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陈怀宇副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留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研究的贡献”的学术演讲。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教授主持。

针对“中国留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研究的贡献”这一主题，陈怀宇教授根据时间顺序将其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8年以前，第二阶段是1928年到1949年，第三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第四阶段是1978年到现在。

陈怀宇教授指出，在1928年以前，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为数不多，加之彼时美国高校的汉语教学和中国研究机构也寥寥无几，处于草创阶段，所以中国留美学者中从事汉学研究的更是屈指可数。1928年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年1月在美国成立，这所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汉学研究机构后来成为了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同年12月，全美学术界团体理事会在纽约市哈佛



陈怀宇

俱乐部组织召开了促进中国研究的第一次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一共 40 人，来自美国各主要人文学术组织以及一些重要的政府和民间机构，与会的中国留美学者包括江亢虎和裘开明等人。1928 年的该次会议使美国的中国学自此成为全国性议题，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调。

陈怀宇教授详细阐述了第二阶段中国留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研究的贡献。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中国留美学者开始在美国汉学界崛起。时间推移至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二战尾声的临近，美国急需培训战后能够进入盟军收复地区执行民事和军事任务的管理人员，于是哈佛的陆军特别训练班应运而生。哈佛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1943 年开始举办中文、日文培训班，赵元任先生当时负责主持中文训练班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汉语教学，同时介绍战后地区的历史、地理与社会情形。哈佛陆军特训部远东组还曾有叶理绥、赖世和、华尔纳、魏鲁南、胡适、魏特夫、费孝通等语言、文学、艺术史、考古、史学、社会学方面的重要学者授课，杨联升、

周一良等后起之秀担任助教，中文班出了汉学家牟复礼、柯润璞等汉学家。

1947 年 4 月初，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关于“远东文化与社会”的研讨会。大约有 60 名专家受到邀请，他们大多和中国研究有关。其中包括了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以及一些欧亚的著名学者。中国方面则有冯友兰、陈达和梁思成等著名学者参加。会议议程涉及到中国研究的各个方面，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留美学者在此次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怀宇教授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中国留美学者的组成、学术成就、影响等方面介绍了他们的贡献。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留美学者主要包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留学生以及滞留在美国的学者（洪业、胡适、杨联升等），他们逐渐成为美国高校汉学研究的中心力量，成为这个领域的奠基人，后来的很多美国汉学家都出自他们门下。1978 年以后，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赴美留学和工作，他们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了与中国有关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陈怀宇教授向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汉学研究的主题选择、研究方法、材料运用，不仅使同学们对汉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对同学们今后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就中外学者研究方法异同、文献外译等内容进行了提问，陈怀宇教授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 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 学术交流活动第十期举行



2017年4月16日下午，由剑桥东方文化学会、北外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主办的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第十期举行，剑桥大学心理系博士孙睿作了题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社会认知”的学术演讲。

孙睿博士阐述了SES概念(Socioeconomic Status, 社会经济地位)，分析了SES对社会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包括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儿童发展、大脑容量、情绪认知能力和道德行为等方面，具体介绍了她的两个项目及向下的子研究。其研究成果表明捐赠(donation)和收入(income)都能影响友谊(friendship)，且捐赠对穷人(穷国)的影响要大于对富人(富国)

的影响。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亲社会性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富有同情心可以使高SES的个体减少使用消极对应策略(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低SES个体使用更多积极应对策略(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并更愿意提供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s)。之后，她举例说明了这些结论在生活中的应用。

在提问互动环节，面对大家的踊跃提问，孙睿博士详尽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介绍了心理学研究方法、人格测试方法，推荐了两本心理学入门书目：《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和*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 对亚洲五国近年来跨境资本流动的 观察与比较研究<sup>1</sup>

任康钰 何林远 张永栋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 摘要

本文观察了亚洲几个国家在近年来的跨境资本流动状况，对其规模、结构、原因、影响等进行比较研究。文章以中国为中心，选取了日本、韩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首先对它们近年来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观察；然后结合目标国的经济状况、国际宏观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探讨资本流动背后的原因；最后就这几个国家在跨境资本流动中表现出的特征及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重点探讨中国在资本流动、外汇储备管理等方面能够获得的启示。

### 关键词

资本流动 外汇储备 新兴经济体

<sup>1</sup>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对亚洲五国近年来跨境资本流动的观察与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

##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几年间，全球的国家间资本流动状况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之前涌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洪流，如今在大多数国家或已渐进萎缩，或正回流到发达经济体去寻找更安全的处所。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与规模的显著变化因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随着二战后各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国家间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再加上制度变化和科技进步等因素，国际资本流动从1970年代开始就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并由此引发了海内外学界围绕跨境资本流动的大量研究。

一些文献探究了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动因，以及影响其方向和规模的因素。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国家间生产率增长水平的差异决定了跨国资本的流向与分配，即净资本流入的方向是人均资本存量更低、资本边际产品更大、生产力增长更快的国家和地区，从而使投资者实现更高的资本回报率。然而，Feldstein和Horioka（1979）提出以追求更高收益为目标的资本流动规模受到资产配置偏好和制度壁垒的限制；同时，由于许多外商直接投资（FDI）意在强化投资国的贸易地位或利用某种专门技能，此类资本流动对国家间的储蓄率差异和相对资本密集程度并不敏感。Gourinchashe和Jeanne（2011）研究发现许多国家生产率的增长水平与其人均资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国家间生产率增长水平的差异决定了跨国资本的流向与分配，即净资本流入的方向是人均资本存量更低、资本边际产品更大、生产力增长更快的国家和地区，从而使投资者实现更高的资本回报率。**

本净流入不相关甚至负相关，跨国资本的流动模式受到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率、政府对国际储备的管理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学者还将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具体分为拉动因素（即流入国本国导致资本流入的因素）与推动因素（即流入国之外导致资本流入的因素）。前者主要包括高利率、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外部融资需求、汇率制度与制度质量等，后者主要包括国际机构投资者的高风险偏好、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低利率与国际投资者的资产多元化等（Reinhart和Montiel，2001）。Milesi等（2011）的研究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当投资者普遍持悲观预期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会出现突然中止，当投资者恢复信心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流入规模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一体化以及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因此，经济处于

不同状态（即危机和常态）时，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存在较大差异。Ahmed和Zlate（2014）通过研究决定新兴市场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Net Private Capital Inflows）的因素发现，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和利率差异以及对全球风险的吸收能力的差异是影响私人资本净流入的显著因素；而且，部分出于利差的敏感性和风险规避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通过证券组合投资的流入（Portfolio Inflows），有着显著不同。近年来，各国陆续推出的资本控制对整体资本流动和投资组合流入存在抑制作用；美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也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变化有显著的相关性（Clark et al., 2016）。

在此类研究基础上，另一类文献集中在资本流动带来的影响上。Lipse（1999）等文献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可以使投资国和接收国受益：为前者提供丰富的投资机会、多样的投资组合使其实现更好的风险对冲和更高的资本收益，为后者缓解资本短缺、减少投资储蓄对消费的挤占、减轻经济周期和波动的影响。而且，资本流入还会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也驱使接收国的政府和企业规则上与世界接轨，在治理上更加透明和有效。然而，国际资本流动同样可能带来相当的潜在风险（Martin Feldstein，1999）。在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债务危机和90年代末的

亚洲金融风暴中，大量涌入的海外资本推高了投资目的国的资产价格，催生经济泡沫和“经济过热”，并造成其对海外资本的过度依赖，形成市场扭曲，给一国经济乃至区域和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终在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异动的冲击下造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甚至是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而且，国际资本市场的紧密联系还会进一步强化危机的“溢出效应”。

除了从理论上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问题，还有很多文献是从实证角度展开的。首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统计方法和口径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更为清晰、准确地把握其规模和构成。尤其是其中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因为波动性强、流动规模变化大、流动方向容易改变，更容易对一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其次，一些文献通过实证检验，定量地分析一些经济指标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程度，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对一些经济指标的影响（Dani Rodrik 和 Andrés Velasco, 1999; Jansen, 2003; 等等）。最后，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就是把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其异常波动，跟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探讨可能会引起危机的国际资本流动信号等（Dani Rodrik 和 Andrés Velasco, 1999; Forbes 和 Warnock, 2012; 张明和谭小芬, 2013），主要包括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例、全球风险和传染、资本流入突然停止甚至逆转等。

### 除了从理论上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问题，还有很多文献是从实证角度展开的。

可见，现有的研究非常深入地探讨了国际资本流动这一现象，并形成了一些有启发的研究成果。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尤其是在2014年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其中一些受到较大影响的亚洲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经历了相当显著的变化，而这些是已有研究尚未深入涉及的。因此，本文将根据最新的数据与观察，对几个较为典型的、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下的亚洲国家进行研究。本文首先确定五个有代表性的目标国家，对他们在近年来的跨境资本流动状况进行观察，然后再结合目标国的宏观经济表现等相关因素进行原因分析，进而探讨这样的资本流动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同时重点围绕中国在外汇储备管理、资本流动政策制定等方面可以获得的启发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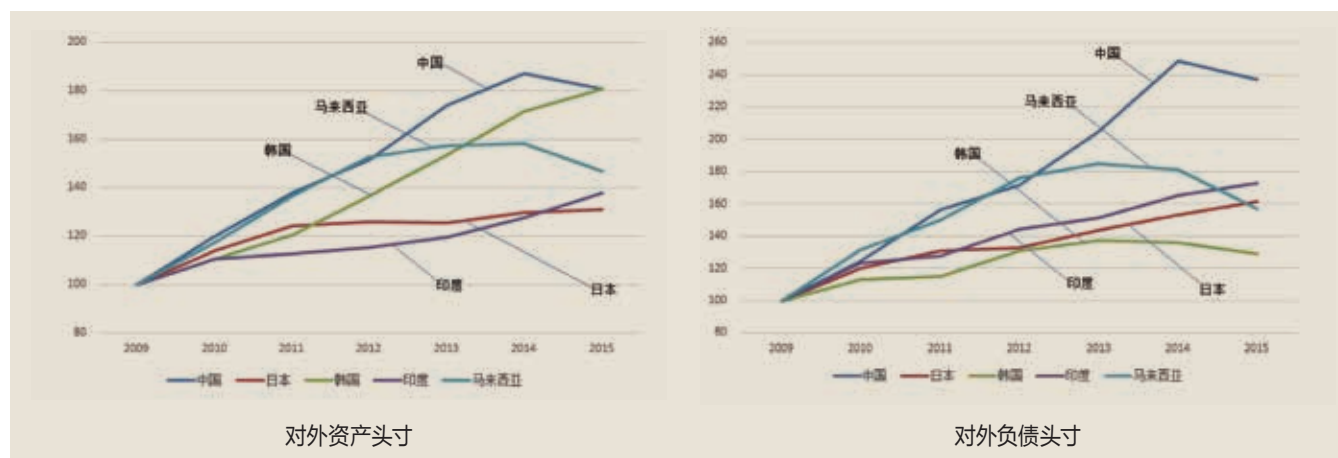
## 二、目标国及其跨境资本流动的总状况

亚洲的国家（地区）众多，必须有所选择，才会使研究更有效率并得

到较有意义的结果。我们把中国作为比较研究的中心，除此之外，还选择了日本、韩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四个国家。日本是亚洲地区最为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也举足轻重；韩国曾经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明星成员，现已被纳入到发达国家俱乐部 OECD，而国际资本流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印度——亚洲的另一个人口大国，作为后起之秀，近年经济发展上强势的表现直逼中国。马来西亚作为东盟国家之一，国际资本流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曾经是该国之前金融危机的诱导因素。因此，选择这几个亚洲国家，既有一定的代表性，也能揭示尽可能多的信息和发现。一国与外部世界发生的资本流动，可以是伴随着贸易活动产生的，更多地则是出于逐利动机形成的。在记录一国与外部世界经济交易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反映了主要由私人部门活动形成的资金流动；储备资产则是一国货币当局与外部世界资金上的互动。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了一段时间里经济活动产生的流量数据。这些流量数据最后又形成资金上的存量数据，即国际投资头寸。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统计数据首先对亚洲五国近年来资本流动的总状况进行观察。

根据国际投资头寸表，图1给出了这几个国家的对外资产头寸（Foreign Asset Position）和对外负债头寸（For-

图 1：亚洲五国的对外资产头寸和对外负债头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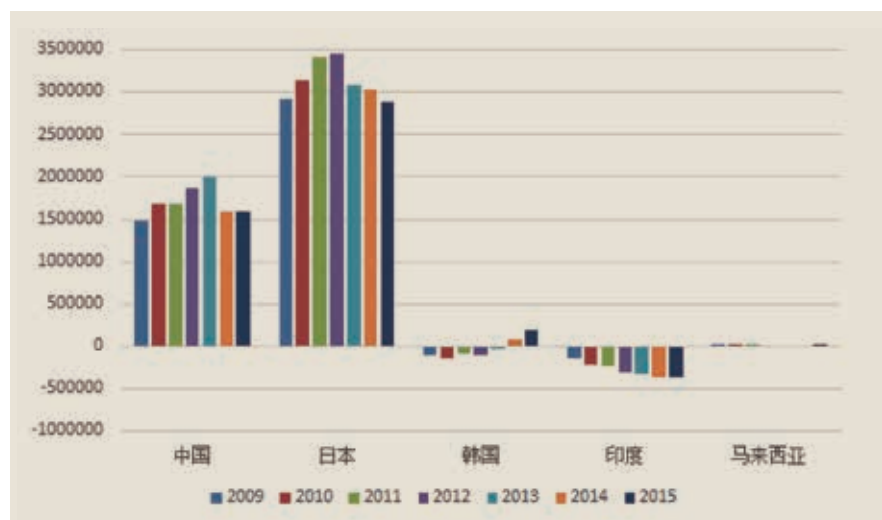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IMF Data。以 2009 年为基期 100，五国各自的资产、负债头寸进行指数化。

eign Liability Position) 情况。

为了把几个国家放在一起对比观察，我们对数据进行了指数化处理。实际上，各国的头寸的绝对值差异非常大，图 2 给出了这几国的对外净头寸实际值。

图 2 直观地显示出日本的高额净头寸。其实，日本的净头寸不但在五国中最高，长期以来也是世界上最高的。2009 年到 2012 年其净资产稳步攀升，在 2012 年达到峰值（3.46 万亿美元）；但其净资产从 2013 年开始下降，2015 年到 2.88 万亿美元。下降的原因在于 2013 年到 2015 年负债头寸的增长率大于资产头寸的增长率（如图 1）。中国的净头寸规模也非常大，在 2015 年以前仅次于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但到 2015 年，德国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债权国。中国的净资产头寸在 2009 年到 2013 年逐步增加，2013 年达到峰值 1.99 万亿美元。但

图 2：亚洲五国的对外净头寸（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IMF Data。

2014 年出现了一个不小的下降，2015 年继续略微下降。

其他三国的净资产头寸要小很多，具体变化也有所不同。韩国在 2009 年到 2013 年是净负债国，但 2014 年开始扭转，成为净资产持有国，并在

2015 年大幅增加（从 876 亿美元到 1988 亿美元），归因于其在这两年里对外资产大幅增加，同时对外负债急剧减少。马来西亚净投资头寸变化则与韩国恰好相反，在 2009 年到 2011 年为正值，2012—2014 年则变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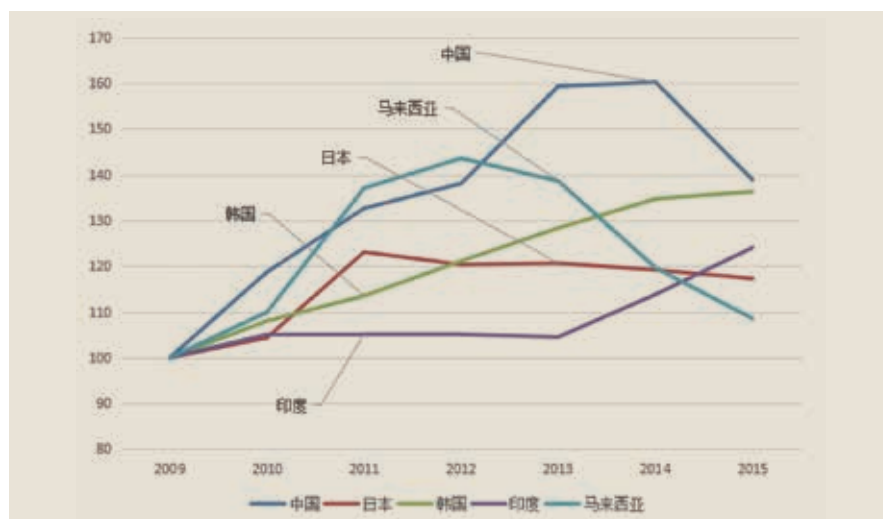
负值。印度从2009—2014年的净投资头寸呈现负值并且逐步扩大，对外负债增长率明显高于对外资产增长率。除了对外资产、负债头寸的总体情况，一国由公共部门持有的储备资产，在人们观察一国跨境资本流动中往往受到特别关注。那么，这五国在观察期里经历了怎样的外汇储备变化呢？

日本的外汇储备在2009—2011年增加，2011—2015年则出现缓慢下降。这似乎与其净头寸在2009—2012年的增加相矛盾，但实际上是因为其储备资产占比较低（16%），所以先于净资产头寸下降。中国外汇储备从2009—2014年不断增加，但增速已经明显放缓，2014年末达到峰值3.84万亿美元，之后开始下降。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对外资产中比重很高（65%），因此其变化基本与同期净资产头寸的变化一致。

韩国外汇储备在2009—2015年间不断增加。由于储备资产在对外资产的比重近40%，因此储备的持续增加使其净投资头寸从2013年前的负值转为正值，且不断增加。印度外汇储备在2009—2013年基本保持不变，2013—2015年则增长迅速。尽管印度的储备资产在对外资产中占比近70%，但由于其对外负债增长更快，使其净资产头寸仍然为负，且不断扩大。马来西亚的外汇储备在2009—2012年间增加，但2012年后就开始减少，基本上与其对外净头寸的变化方向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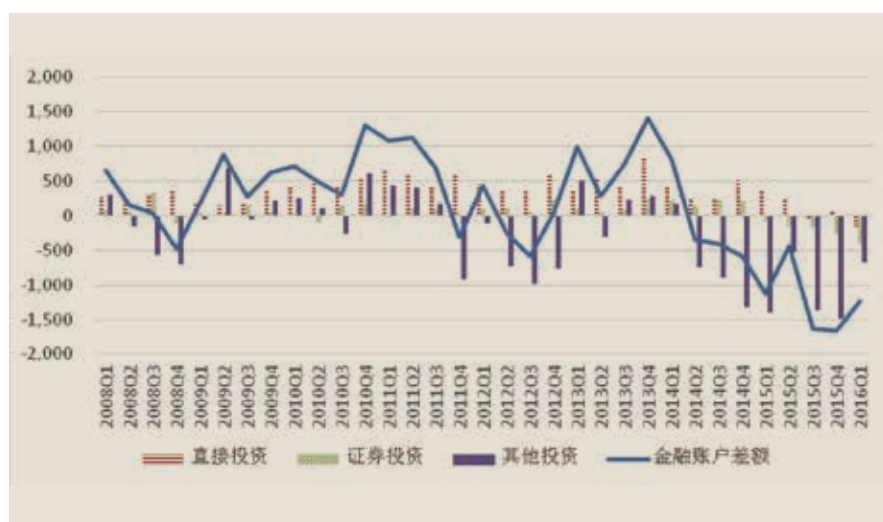
以上我们通过亚洲五国的对外资

图3：亚洲五国外储年度数据（2009—2015年）



数据来源：IMF Data、同花顺 iFind 数据库。为了对比，这里以2009年为基期，分别以五国2009年各自的外汇储备数据为基数，指数化为100。

图4：中国的金融账户差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局(SAFE)

产负债头寸和外汇储备观察了其跨境资本流动的总况，看到了近年来这些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一些新情况。那么，总况背后有具体的情况，

各国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点，这些变化又会有什么影响等，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分析。

### 三、目标国近年来跨境资本流动的原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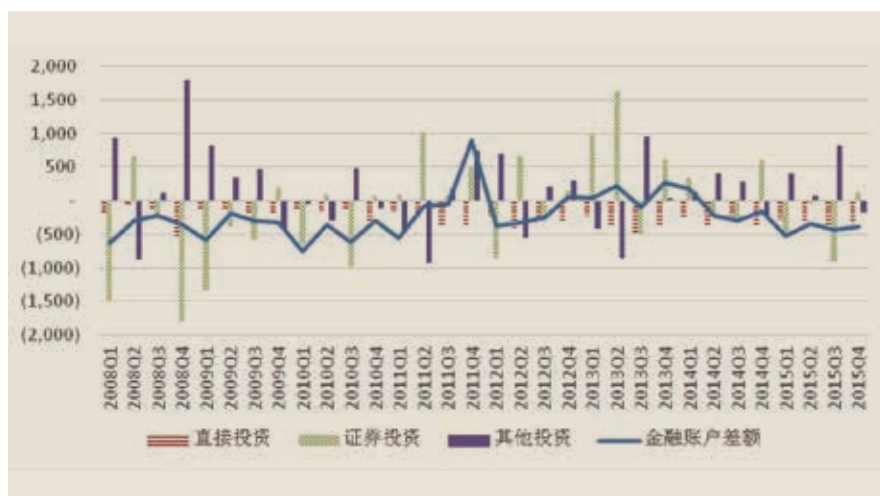
跨境资本流动是各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结果，可以反映在金融账户的具体项目即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上。这些具体项目下的资金流动，是形成上面所观察到的总体状况的直接原因。

中国在 2008 年至 2011 年底，金融账户上保持净流入；2012 年后出现双向波动，但仍然以净流入居多；2014 年第二季度后，双向波动被净流出取代，这种趋势延续至今，且规模有扩大态势。

具体地，直接投资在数额和方向上相对稳定，但净流入额在 2014 年后开始缩减；其他投资余额波动幅度更大，也较频繁，2014 年第二季度起，由双向波动转为大额净流出。这与 2014 年下半年后，尤其是 2015 年“811 汇改”后，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中国居民加速偿还外债，增加海外资产配置有关。2008 年以来证券投资基本维持净流入，直至 2015 年第一季度后出现了持续且不断放大的净流出。另外，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和看空人民币情绪积累，“热钱”不断流出，部分通过地下渠道向海外转移，反映为“净误差与遗漏”，在 2014 年第二季度后由双向波动转为较大金额的正值。

日本在 2008 年至 2015 年底，基本维持了对外净投资国地位。具体来看，直接投资保持较稳定的净流出，私人跨境资本的波动主要出现在证券投资

图 5：日本的金融账户差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IMF Data

图 6：韩国的金融账户差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IMF Data

资和其他投资项下。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后，全球避险情绪高升，大量海外资本撤离亚洲，同样出于避险，日本投资者减少了海外资产配置，体现为 2008 年至 2009 年较大规模的证券投资净流出和其他资本回流。金融

危机来临后，美联储开始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资本的迅速回流表现为迅速缩小后转为双向波动的证券投资净额。2011 年 3 月东日本大地震后，出于对灾后保险理赔和重建对资本回流的预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资本净流入。

2013年上半年受“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积极情绪影响，证券投资出现两个季度的较大规模净流入，日经指数一度走高。此后，日本经济表现并不理想，证券投资净流入规模缩小并转为双向波动。2013年至2015年，由于日本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使日元相对美元汇率贬值，部分日本居民在日元汇率较低时卖出了海外资产，体现为其他账户项下不时的净流入。

韩国在2008年至2016年第一季度，由净资本双向波动逐渐转化为对外净投资。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其跨境资本流动经历较剧烈波动。韩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证券投资受美国货币政策等国际因素影响的波动也较显著(Cho和Rhee, 2013)：由于金融危机海外资本撤出，证券投资大额流出，后来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快速回流。2011年第三季度后，韩国基本成为对外净投资国，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流出规模较大，而直接投资自2008年以来也维持了较稳定的对外净流出。

经济倚重大宗商品出口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的马来西亚在2008年到2016年第一季度经历了较为剧烈的国际资本波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形成较大冲击，持续时间也较长，大规模净流出持续到2010年第三季度，此后为频繁的双向波动。证券投资受危机后全球宽松货币政策

图7：马来西亚的金融账户差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IMF Data

图8：印度的金融账户差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IMF Data

影响，在2009年第三季度后出现净回流，直接投资则以净流出为主。<sup>1</sup>2014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步步下挫，马来西亚货币持续贬值，跨境资本波动加剧，净流出

规模有所放大，证券投资净流出尤其突出。这也与2015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没有重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强化资本控制的老路、基本保持了市场开放水平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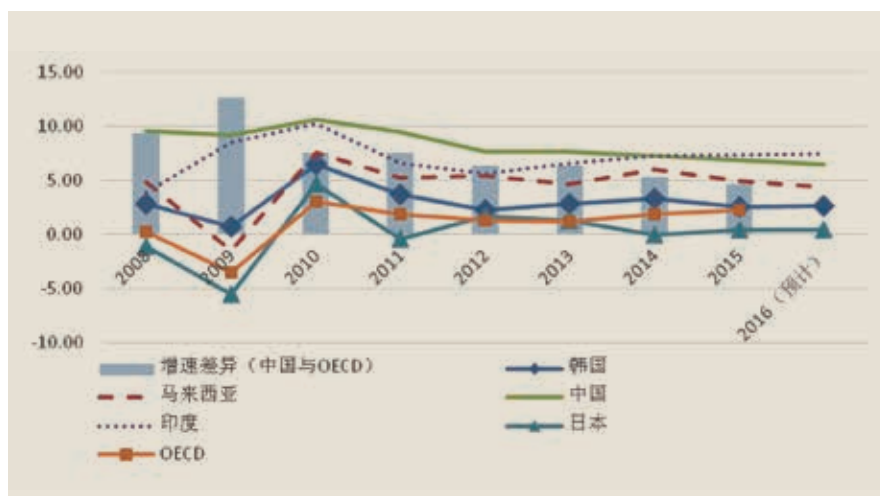
1 2010年后马来西亚已不再向IMF提供BOP中其他投资项下资本流动的统计数据。

印度在 2008 年至 2015 年第二季度基本维持了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偶有一定波动（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为主）。在多数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印度吸引的直接投资稳中有升。不过，2008 年第三季度至 2009 年第二季度和 2013 年第二、三季度，印度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前者是受金融危机资本撤出影响，后者是出于市场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担忧，均由海外资本大规模抛售印度证券资产主导（Gupta, 2016）。

除了分别影响上述五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具体原因外，一些普遍性因素也可能影响着国家间资本流动，如经济体之间增长速度、利率、市场避险情绪等。一些文献对这些因素进行了论证，也为我们解释亚洲五国国际资本流动背后的原因提供了启示。

第一，不同国家之间 GDP 增速的差异是影响国家间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的重要因素（Ahmed 和 Zlate, 2014）。2014 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金融账户差额由正转负的变化与中国 GDP 增速放缓、OECD 国家 GDP 增速差异缩小几乎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私人跨境资本流动经历了大幅度波动。Ahmed 和 Zlate（2014）的研究发现，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间实际 GDP 增速<sup>1</sup> 差异一个百分点的变化给跨国私人净资本流动（Total Net

图 9: 亚洲五国与 OECD 国家年度 GDP 增速 (单位: %)



数据来源: IMF Data,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Private Inflows) 带来的变化量相当于该经济体 GDP 总量的 0.3%—0.5%。2014 年第一季度至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与 OECD 国家 GDP 增速差距减少了 0.8%，而中国金融账户余额的净变化量达到了中国 2016 年第一季度 GDP 的 1.28%，可见中国跨国资本流动的波动幅度之大。随着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 GDP 增速的差距逐步缩小，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首次成为对外净投资国（净投资差额约 200 亿美元）。2015 年中国成为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出国。

同样的，五国中另两个新兴市场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国际资本流动与其 GDP 增速变化也有较明显的关联关系。2014 年以来，受大宗商品价格下挫影响，马来西亚 GDP 增速放缓，

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海外直接投资减少。印度 2015 年 GDP 增速达 7.6%，自 1999 年来首次超过中国，同期印度直接投资净额稳步上升。同理，亚洲的两个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与新兴市场国家间 GDP 增速差异促使其在这一时期保持了对外净投资国地位。

第二，经济体间的利率差异会显著影响跨国资本流动的方向和数量（Ahmed 和 Zlate, 2014）。近年来，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回暖，失业率不断下降，维持了多年超低利率的美元进入加息通道。2015 年 12 月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 0.25%（预计美联储将在 2016 年 12 月第二次加息）。美元的主导地位会使美国的货币政策和杠杆周期传递到其他国家，影响其金融环境（McCauley 等, 2015）。面对中国经

1 在该论文中发达国家实际 GDP 增速由美国、日本、欧元区国家、英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几国数据综合得出。

济下行压力，2015年至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五次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共计1.25%，6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共计2.75%，另有0.5%的定向降准，中美之间名义利率差异不断缩小。中美之间利差减小与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促使中国企业和居民增持外币资产，并通过提前还款等手段减少美元负债。美元的加息和升值预期也引发韩国和日本在2015年下半年度减少了其他投资负债额。<sup>1</sup> 2011—2015年，印度的名义贷款利率在10%左右，2014年下半年以来通胀率在5%—6%左右，印度与发达国家之间较大的利差可以部分解释该国的资本净流入。

第三，全球市场的避险情绪影响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证券投资项目差额（Ahmed和Zlate，2014）。中国的证券投资在2015年后一直保持净流出。这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挫，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低迷，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如市场波动性指数VIX）在2015年之后相对上升几乎处于同一周期。同期，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证券投资也都基本呈现净流出趋势，且规模有所放大。概括来说，美国经济复苏形势相对明朗，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利率下调、汇率承压等多

### 其实，与其将外汇储备作为跨境资本流动的一部分观察，不如将其看作是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结果。

重因素相互影响和叠加，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长期趋势上，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私人跨境资本（Gross Private Inflows）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快速抽离，在2009—2011年迅速回流，但流入规模在2012年后逐渐下降，2014年后下降速度加快，而中国的跨境资本波动尤其显著。这反映了对新兴国家信用水平的担忧（以中国为例，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高企，居民负债也在上升）和避险情绪的抬头使国际投资者在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上越发谨慎（External Credit Crunch）（Clark等，2016）。我们研究的三个新兴市场国家中，仅有印度凭借稳健的经济增速基本维持了资本净流入国的地位。

### 四、目标国近年来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

以上我们观察了亚洲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近年来所经历的跨境资

本流动状况，并在对比中分析了一些新现象出现的原因。这些原因中，有的和该国内部的经济、制度环境有关，有的则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从上面对这些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它们还具有一定的持续性。那么，这样的资本流动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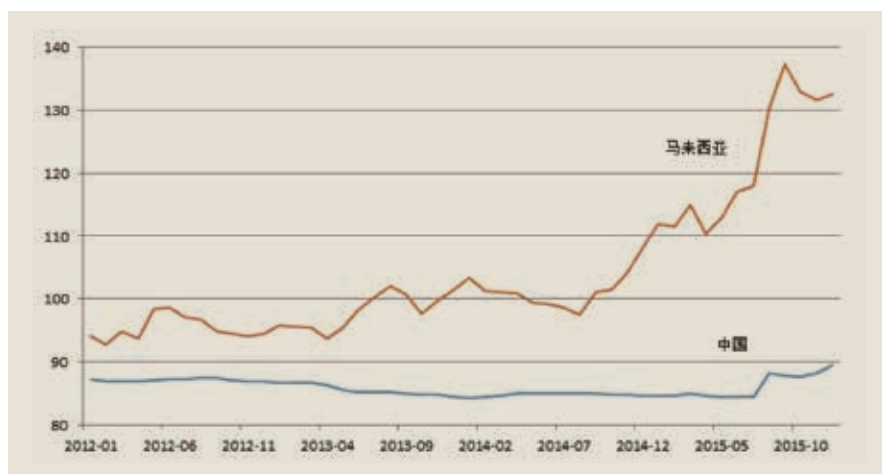
首先，图3中显示了五国外汇储备在近年来的变动情况。其实，与其将外汇储备作为跨境资本流动的一部分观察，不如将其看作是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结果。较大的资本外流会带来金融账户差额减少、本币贬值压力增加；一国为了维持币值，往往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从而引起外汇储备减少。这正是近年来目标国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其中尤其以中国和马来西亚为甚。

中国的金融账户先于2014年第二季度起开始出现连续大额净流出，一个季度之后外汇储备开始减少；2015年进行的“811汇改”又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贬值压力，短时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迅速下挫；<sup>2</sup>随之而来的是2015年第三季度起中国储备资产净流出规模骤然放大，从前一季度的444亿美元增至1626亿美元，并在第四季度继续放大至1669亿美元。此后，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趋势下，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从2014年8月3968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缩减到

1 IMF自2010年起不再提供马来西亚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他投资项下的有关数据，故暂不讨论国内外利差对该国近几年资本流动的影响。

2 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8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欧元与日元汇率分别贬值了9%、10%与33%。

图 10：中国、马来西亚货币的汇率走势



数据来源：IMF Data。以 2008 年 1 月为基期，取当月美元兑各个货币的汇率进行指数化为 100。

2016 年 10 月底的 31206 亿美元。马来西亚的外汇储备减少比中国还早，而且，除了持续的资本流出带来的影响，还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带来的经常账户顺差减少的因素。同期，其货币也较大幅度的对美元贬值。

外汇储备会随着跨境资本流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会进一步对一国货币、经济等产生影响。尤其是像中国、马来西亚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外汇储备减少带来的影响是需要我们更为关注的。

外汇储备作为中央银行的资产，其下降可能会带来基础货币的减少，从而减少流动性，带来市场利率的提高，而这会抑制投资和消费。同时外汇储备下降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会反映在预期层面，因为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可以在外汇市场和对外债务中使用的重要资源，能够产生巨大的心理作

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下降，不免会对人们之前形成的稳定预期带来冲击。外汇储备作为一国的外部资产，它的变化可能存在一定的“刚性”，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在 2014 年年中之前，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上保持着储备不断积累的态势，并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最优规模”的讨论，很多国家甚至已经大大超过了理论中计算出来的“最优值”。但是，一旦外汇储备的变化出现相反的方向，就很容易引起担心，可能被解读为某种危险的信号。一些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可能与其宏观经济增长的困境有关，比如出口增长乏力，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采取的就是出口拉动战略。另一方面，这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有关。如果一个国家采用的不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人们自然会对其外汇储备的变动尤其是减少非常

敏感。在固定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的不断减少持续刺激着货币贬值预期，使得汇率承压、资本外流，并对一国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威胁。外汇储备这样的“刚性”，就需要中国、马来西亚这类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关注。

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除了可能对外汇储备这一官方资产形成冲击，更多地是通过私人部门发挥作用，并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从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大多数文献都承认国际资本流动可以使投资国和接收国受益。我们所观察的五个亚洲国家，无论是作为国际资本的流入国，还是资金的输出国，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因其与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而受益其中，除非是资本流动发生较为异常的变化。例如，韩国和马来西亚在 1998 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就经历过这种变化。那么，近年来的资本流动变化会带来什么不同影响呢？

经济发达程度最高的日本，尽管在 2013 年后净资产头寸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基本不改变其对外净头寸情况。再加上其直接投资项目较为稳定，因此，尽管其证券投资项目等在波动，但应该对其整体经济情况不会有太大影响。

韩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从原来的净负债国转变为净资产国，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下，都出现了资金的流出。这种变化也符合文献中对资本流动方向的判断，即投资者为了获得更

高的资本回报率，会将资金投向人均资本存量较低、资本边际产品较大的地区。韩国在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的之后，资本回报可能开始进入边际递减的阶段，需要向外寻求更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如果这些向外投资能够在风险和回报率上有合理的控制，无疑会使其整体经济发展受益于资本流出，同时也使韩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发生改变。

中国直接投资项下的变化与韩国有类似之处。长期以来，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已经开始从吸引直接投资转为对外进行投资。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向“新常态”转型、鼓励企业“走出去”的表现。不过，在对外投资领域，中国还处于摸索阶段。是否能够更为合理、有效地进行对外投资，影响着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成败。与韩国不同的是，中国近年来在证券投资等项目上的资金流出则与人民币贬值趋势关系紧密。经济下行、资本加速外流与人民币贬值相互影响，可能形成负面预期的“自我实现”，更有可能造成负面冲击。尤其是结合上文对外汇储备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种冲击的具体表现。

马来西亚受到的影响在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减少这一方向上与中国类似。当然，作为相对依赖大宗商品和原材料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



结构较为单一，受到资本波动加剧的冲击可能会更大。不过，从另一方面讲，马来西亚的经济和资本流动的总规模有限，所以比较容易通过及时的资本流动管制措施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较大负面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溢出效应”也较小。

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情况不同，印度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后起之秀，近年来基本维持了国际资本，尤其是直接投资的净流入，而且保持了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印度有望借

助国际资本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也会加强人们对其经济增长的信心。

## 五、总结及思考

以上我们观察了亚洲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总体上来看，各国在对外资产和负债的头寸上，近几年里呈现出较为不同的变化趋势；这些不同又具体地通过资本流动的各个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反映出来。

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既与每一



**另外，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呈现出的一些新的国际资本流动状况，一方面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则进一步促进这些国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发展。**

.....  
提供较为良好的经济环境（Aizenman & Lee, 2007）。而近年来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外汇储备减少，可能会对汇率预期、甚至宏观经济的一些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呈现出的一些新的国际资本流动状况，一方面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则进一步促进这些国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发展。比如韩国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对外投资的需求在增加，因此逐渐增多的国际资本流出可能使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增加投资收益；中国现在也在不断加大企业“走出去”的力度，这样的资本流动状况会促进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转换；而印度还处于吸收直接投资的阶段，使资本的流入贡献于经济增长。

但是，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波动因素，必须引起相关国家的关注，并相应地采取政策措施减轻可能造成的冲击。由于中国是我们观察的中心，因此根据

前面的分析，我们特别提出对中国在资本流动方面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首先，中国近一两年来外汇储备减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是人民币的持续贬值。那么，是否要利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抑制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呢？人民币汇率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已经越来越市场化；再加上其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已被纳入SDR的篮子货币。人民币在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下发生的汇率波动，应该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因此，除非发生短期的剧烈变动，否则不宜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其次，在对外直接投资上，我国已开始成为输出国。这对于我国企业的全球布局具有积极意义，也与我国当前推行的“一带一路”政策等相辅相成。但是，向外投资不仅仅是资金的输出，还涉及到管理、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因此，在继续鼓励向外投资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最后，我国在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上也在采取逐步放开的措施，但是，在国际资本流动发生剧烈波动时，可以在这些项目上实施必要的临时性管制措施，或者放缓开放的步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不但对本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大。因此，密切跟踪跨境资本流动情况，并相应地采取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有关，如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等因素；也与一些一般性因素有关，比如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及加息预期、全球避险情绪等。还有一些因素我们没有涉及，但可能也会有所影响，比如人口老龄化。

这些因素共同带来了这些国家在跨国资本流动上的一些新现象。这些变化首先就反映在对外汇储备的影响上。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把积累外汇储备作为外部平衡中的一个潜在目标，希望以此稳定外部预期、为本国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mailto: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6556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